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

王 俊^a, 蒋楠楠^b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a. 对外经济研究所; b. 文化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要: 经济学认为, 相对需求而言, 社会资源是稀缺的。稀缺资源的事实使经济参与者为获取有限资源而展开竞争, 竞争既存在于市场, 也存在于政府之间。研究政府竞争就必须分析为竞争创设激励的财政分权。从财政为何分权、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形式、财政分权影响政府竞争的机理以及财政分权激励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效应等问题入手, 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关键词: 财政分权; 地方政府竞争; 激励

中图分类号: F8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21)06-0032-08

一、财政为何分权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在税收权利、支出责任范围以及预算支出规模等方面给予地方一定自主权利。对财政分权的探讨离不开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分析。中央为何要向地方进行分权呢? 对于该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从分权的信息优势和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地方政府激励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 信息优势和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Tiebout(1956) 提出“用脚投票”理论(Tiebout 模型) 被视为现代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标志^[1]。由于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 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品与服务的提供者, 比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 中央向地方分权将有利于提高公共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因此,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进行职能划分, 即中央政府主要行使收入分配与经济稳定职能, 地方政府则主要行使资源配置职能, 中央和地方间的这种职能划分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Musgrave, 1959)^[2]。

著名的“分权定理”表明, 分散化提供公共品具有比较优势, 地方政府较之中央政府而言更能够知晓其辖区居民的效用与需求, 在人口异质性较强且需求具有较大异质性的情况下, 对于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 由地方政府来向各自辖区居民提供将会更具有帕累托效率(Oates, 1972, 1993)^[3-4], 这说明财政分权将能够通过增进经济效率而提高社会福利。Oates 还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于分权的影响, 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地方政府相对能够更充分地了解本辖区内居民的偏好, 因此有必要进行财政分权。

(二) 地方政府行为

“怪兽理论”认为, 地方政府是内在不断膨胀且缺乏效率的, 类似于一个规模不断膨胀的怪兽。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目标更多地表现为财政收入最大化而并不总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Brennan & Buchanan, 1980)^[5]。对此, 有必要通过分权来约束政府规模, 从而使社会福利不会因政府拥有过大政府势力而受到损害。此外, 由于信息不完全以及不确定性的存在, 中央政府有可能错误地认识社会偏好并强加于民, 因此有必要分权给地方来实现福利最大化(Tresch, 1981)^[6]。

上述文献提及的分权源于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思想,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 在

收稿日期: 2021-0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JY168);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高端人才创新项目(CXGD2108)

作者简介: 王 俊(1982-), 男, 贵州遵义人, 博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金融发展。

政府间对公共产品和服务实行分权管理,可以有助于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水平,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的辖区与居民偏好不相符这一问题,而接下来即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则从行政过程、委托代理以及信息不对称角度对财政分权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三) 地方政府激励

Qian & Weingast(1996)认为,公司经理作为代理人存在利己心理,政府官员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公司层面的委托代理问题可以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来有效的解决,政府管理体制(分权)也有助于遏制官员的自利行为,由于资源可流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围绕资源的竞争将会导致有效率的结果出现^[7]。此外,有学者通过从财政激励的角度分析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问题后认为,俄罗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上级财政,缺乏培育税基和改善公共品供给的动力,因此,中央与地方实行收入分享体制将能够显著地影响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分权是重要的^[8]。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是一个中央向地方进行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权力下放的过程,地方政府随着权力的下放拥有了更多的财政自由裁量权。然而,这种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财政分权过程始终伴随着政治集权,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共存是中国有别于西方联邦制国家的特有之处,在这种特色体制下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不仅使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地方财政收益,而且也使中央保留了对地方官员的绝对权威。

现有研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进程进行了阶段性划分,主要有张璟和沈坤荣(2008)^[9]将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9年,主要特征是高度计划经济;第二阶段是1980—1994年,主要特征是“分权让利”;第三阶段是1994年以后,主要特征是“分税制”改革。从财政体制演变进程来看,财政分权主要有四次大规模的分权行为:第一次是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体制;第二次是1971—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体制;第三次是1980—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第四次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刘卓珺和于长革(2010)^[10]将财政分权演进分为了三个阶段,即1949—1979年间的高度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分权化调整阶段、1980—1993年间的财政包干体制与财政分权初始阶段、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与经济性分权的实现阶段,其分析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并存;二是属于自上而下式的供给主导型分权;三是现行分税制不是权力的明确划分,而是税种的划分;四是中国式财政分权法制基础比较薄弱;五是政府行为缺乏应有的约束与监督。此外,余世勇和朱咸永(2019)^[11]将财政分权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78、1978—1994、1994—21世纪初以及21世纪初至现在,其分析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集权分权都是围绕国家发展需要而展开,而这种需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存在差异的。通过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演进过程的梳理发现,不同阶段的分权行为有着特定的经济背景和现实诉求。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期间,大一统的财政体制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信息不对称严重,中央政府难以有效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地方政府也由于权力受限而无法发挥信息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权力释放迫在眉睫。1978—1994年期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破除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激发市场和政府活力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这推动了“放权让利”以及“财政包干”时代的到来,财政包干制的实施使地方政府在完成向中央政府缴纳的财政收入额之后,其余部分属于地方政府所有,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需求,是对高度集权财政管理体制的突破,然而,其依然按行政隶属关系进行的收益分权模式却导致了地区封锁、市场分割以及经济结构失调等问题,经济转型发展的需求日益强烈,催生更加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

为抑制“两个比重”不断下降等问题,1994年,财政体制开始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需进行分税制的分权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实施使中央和地方之间开始按照税种(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而不是行政关系来进行收入安排。虽然分税制是财政分权改革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但改革的结果却不均等,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例来看,改革后的占比明显少于改革前的占比,收入占比减少与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没有多大变化的事实相结合,导致了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象。此外,在

体制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还需承担国企破产的兜底成本以及大量再就业群体所产生的必要支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都需要地方政府加以消化并解决。分税制改革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这并没改变分权的特征与事实,分权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依然存在且有效(官永彬 2011)^[12]。同时,随着财税改革的逐步深化,实行具有更加规范、公平的财税体制势在必行。

2018 年,作为征管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国税地税实行合并,这标志着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税体制向“统一税制,公平税负”税制转变,国税地税合并不仅提升了中央和地方协同治税能力,而且促进了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并理顺了统一财政和分级财政关系(陈超 2019)^[13]。国税地税合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税制改革利民、利税、利企、利国。如果说在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争夺资源出现了诸多不规范行为,那么国税地税合并将能有效规范地方政府税收行为,有效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并优化政府服务(杨晓妹等 2019)^[14]。

三、地方政府竞争形式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相关文献对于地方政府竞争形式研究较为广泛,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 公共品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不但可以使公共品供给更具有效率,而且还能激励地方政府寻找并改进提供方式(Hayek, 1945)^[15]。公共品竞争能减少财政支出方面的浪费,促使其他地区提高基础设施的多样化水平。实际上,对地方政府有效激励的形成正是中国为什么拥有良好基础设施的重要原因(张军等 2007)^[16]。Bucovetsky(2005)认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有利于吸引劳动力等可流动生产要素的大量聚集,因此,政府会基于公共品投资而相互竞争。但也有可能导致过多地投资于公共品而使竞争成本过大^[17]。朱雅玲(2019)认为,地方政府过度倾向于生产性公共品的竞争会导致该类公共品供过于求,而这又进一步会限制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品的供给^[18]。

(二) 税收竞争

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最大化税收收入。人们会根据对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以及税收偏好来选择辖区,因此地方政府会就税收安排进行竞争。Wilson(1986)^[19]在资本税竞争模型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其分析认为,资本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资本可流动而劳动不能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对可流动的资本征税来提供公共品。然而,如果税率上升,那么资本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向外流出,这对于资本流入地区而言,资本的流入将会增加该地区的财政收入。Bucovetsky & Wilson(1991)^[20]随后修正了资本税竞争模型,他们认为,劳动具有有限的供给弹性,当地方政府规模较小时,将主要会针对劳动收入征税,而地方政府规模较大时,地方政府将会对劳动收入以及资本征税。然而,当存在竞争情况时,地方政府将可能会为了吸引更多的流动性要素而对其进行补贴,同时,大区域的税收竞争较之小区域而言,具有更低的敏感度,因此大区域较之小区域有着更高的税率,这会使得资本向小区域集中,从而改善小区域状况。此外,储德银等(2020)^[21]认为,如果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并且地方政府财力缺乏时,税收竞争将会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竞争手段。

(三) 制度竞争

柯武刚和史漫飞(2000)认为,制度竞争概念突出了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成本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体系的重要性,制度竞争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形式,在经济、政治和行政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2]。杨瑞龙(1998)认为,在分权让利背景下,地方政府由于可分享剩余索取权和资源配置权从而进行竞争,地方政府也因此成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首要制度变迁推动者^[23]。冯兴元和刘会荪等(2002)认为,尽管政府之间的竞争形式多样,但很大程度上都表现为围绕制度而展开的竞争或围绕体制而展开的竞争^[24]。无论地方政府是为了竞争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生产要素,还是围绕产品市场而展开的竞争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强调的是规则和创新,制度竞争和财税竞争一样,都是一种地方政府自发的竞争(郭栋和胡业飞 2019)^[25]。

(四) 其他形式

吴旬(2004)认为,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采取了建立开发区和园区的方式来获得国家的政策

优惠,地方政府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开发区之间的竞争^[26]。李军杰和周卫峰(2005)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竞争,还包括环境、就业及税收等内容,同时,也存在着就争夺 FDI 所进行的竞争以及在收入分享体制下地方政府容忍辖区下企业偷税漏税的竞争^[27]。王华春等(2019)认为,随着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地方政府在环保支出方面也存在竞争,这种竞争是一种策略模仿式竞争^[28]。

四、财政分权影响政府竞争的机理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联,现有相关文献也对财政分权影响政府竞争的逻辑或机理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Breton(1998)认为,在财政分权过程中,一方面,地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将这种溢出效应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成本较高^[29],因此,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竞争性政府”实际上是政府的本质,政府竞争存在于政府中的各职能部门、不同辖区间的政府,各职能部门间会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竞争,不同辖区的政府间也会为了争夺有形和无形资源、居民的忠诚和赞同以及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分配等而进行竞争。

从1980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分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地方政府层面产生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樊刚和张曙光(1994)认为,中央政府放松集权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两种形式的竞争,一种是针对中央政策和资金进行纵向竞争,一种是围绕投资进行横向竞争,这也使得地方政府的竞争局面得以形成^[30]。这表明,由各地区地方政府所主导的政府竞争与财政分权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集权制政府存在着软预算约束,而财政分权可以硬化预算约束,在事权税权统一的情况下,通过向地方政府分权,由地方政府征收本地区的税收,同时负责地区范围内的公共支出,将会必然导致基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服务的地方性竞争。

Qian & Roland(1998)认为,在事权税权不完全统一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保留部分财政收入并以拨款方式分配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由于只拥有部分税权,因此存在着地方政府争取中央拨款的竞争^[31]。刘汉屏和刘锡田(2003)认为,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方面具有了越多越好的特征,这促使其将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府主要的目标予以追求^[32]。换言之,财政分权不仅为地方政府创设了竞争激励,而且能使其在制度的框架内获取更多的财政收益(王文剑等,2007)^[33]。

随着关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研究文献的丰富,政治因素(主要是政治晋升激励)开始被逐渐纳入财政分权的分析框架。周黎安(2004)认为,除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能够激励我国地方政府间进行相互竞争外,地方官员面临的政治晋升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34]。官员晋升所面临的核心考核机制是经济绩效,这也就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更多的落脚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为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张军,2005)^[35]。Tsui(2005)认为,地方官员有着较强的政治激励促使其发展地方经济,而其中重要的渠道就是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36]。在中央政府的政治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府间也因此形成了竞争格局(邓晓兰等,2019)^[37]。

五、财政分权激励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效应

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激励下围绕着社会中的各类资源存在着多样化的竞争形式,这些多样化的竞争通过不同机制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应。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持有正面、负面以及中立三类不同观点。

(一) 正面效应

Edmiston & Turnbull(2003)基于美国佐治亚州的数据分析认为,地方政府通过税率等因素来提升竞争力将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38]。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运用产权、制度和博弈等理论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问题,认为分权促进了竞争,为了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方政府通过让渡股份的方式来形成激励机制,这推动了民营化进程^[39]。辛冲冲和陈志勇(2018)认为,政府竞争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40]。崔志坤和李菁菁(2015)分析了财政分权及由此形成的政府竞争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就产业结构升级而言,政府竞争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竞争有利于东部地区但不利于中西部地区^[41]。

李扬(2001)^[42]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利于融资方式的创新、公共分配行为的规范化和政府管理制度的变革,从而能够实现以最低成本进行最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同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对地方政府具有行政约束,经济上的分权对地方政府具有激励效应,二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创造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此外,刘晓明等(2020)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后认为,政府竞争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43]。

(二) 负面效应

Keen & MarChand(1997)在分析中将基础设施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生活性基础设施,较之生活性基础设施,生产性基础设施能够提高资本的生产率,因此,竞争的均衡结果是生产性基础设施的过量供给而生活性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44]。Young(2000)认为,1978—1997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形成了分权经济发展模式,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加大力度发展边际利润较高的产业,这种过度的产业集中发展导致了过剩产能的形成^[45]。Jayet & Paty(2006)分析了地方政府通过竞争争取投资的成本问题,其分析认为,地方政府会提供过多的投资场所供投资者选择,这会导致资源的过度供给^[46]。张旭昆和李晓红(2016)分析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发行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就三者关系而言,存在着分权越大到过度竞争再到发债成本上升的逻辑^[47]。

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48]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地方保护来获取竞争优势,会使得全国市场无法统一,这种市场分割的现象一方面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保护了落后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确定比较优势并优化产业结构。因此,这种地方竞争扭曲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张恒龙和陈宪(2006)认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会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入过多的财政资源,这将会挤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49]。傅勇和张晏(2007)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会扭曲地方政府在基本建设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出结构^[50]。此外,以GDP增长为主要导向的官员考核指标推动地方政府间进行标尺竞争,这也扩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郭文伟和周媛(2020)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会使得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而这种依赖又将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51]。

(三) 中立方面

陈抗等(2002)、罗小娟等(2018)认为,财政包干体制情况下的分权能够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进而激励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就地方经济发展而言表现为“援助之手”,然而分税制改革下分权却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由预算内转向预算外,就地方经济发展而言属于表现为“攫取之手”^[52-53]。周业安(2003)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三种行为:第一种是进取型。其主要特征是通过技术和制度等方面创新来吸引区内外资源。第二种是保护型。其主要特征是依靠政府性保护来维持和发展本地市场,即地方保护主义。第三种是掠夺型。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各种税费来掠夺当地企业和居民的剩余。如果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属于进取型,那么地方政府竞争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如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属于进取型和掠夺型,那么竞争将可能属于恶性的,这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54]。

靳涛(2005)认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GDP竞赛”的行为,地方政府在“GDP竞赛”的目标下采取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推动了1994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模式具有短视性,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各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供给,基础设施建设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以吸引投资为目的的过度投资将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1994年以来的资本产出比上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就是典型例证^[55]。秦琳贵和沈体雁(2020)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分析认为,财政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外商直接投资竞争这三种竞争形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从第一和第二种竞争来看,其具有积极影响,但从第三种竞争来看,其具有负面影响^[56]。

六、总结与展望

以上从财政为何分权、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形式、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竞争机理以及地方政府竞争效应等视角对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虽然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分析存在着不同视角,如Buchanan等认为财政分权能够限制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地方政府在面临着预算约束的机制下将会展开竞争,而Qian等认为分权给予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激

励,这种激励推动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但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存在着从分权到激励再到竞争的基本经济逻辑,正是由于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创设了满足其不同目标的激励机制,从而推动了地方政府竞争的产生。

如果说体制激励是导致政府竞争行为得以出现的核心要素,那么环境变迁激励则是政府采取多样化竞争形式的根本原因。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公共品、税收以及制度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竞争策略来对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类资源展开竞争。财政分权激励竞争,竞争的目的是获取各类资源,而获取各类资源的目的则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就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效应而言,由于存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视角差异,现有文献认为政府竞争存在着正面的积极效应、负面的消极效应以及根据发展阶段不同而兼具正负效应,竞争效应的这种差异或许说明,体制变化或环境变迁激励所产生的任何行为都具有两面性,分权激励下的政府竞争行为也不例外。理性的适度竞争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而非理性的过度竞争则易于导致资源配置失衡。

中国的经济改革属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式分权改革,分权是改革中的核心内容,因此,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关于分权的相关研究也将成为学术界不断探讨的重要内容。然而财政与金融密不可分,分权事实既存在于财政层面,也存在于金融层面,金融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在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以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中,金融资源成为各地方政府竞相争夺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为“增长而竞争”的过程就是“为投资而竞争”的过程,是地方政府为争夺金融资源的“金融竞争”过程。因此,就分权与竞争的研究而言,如何基于财政分权以及金融分权双重视角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以及存在的潜在经济效应或许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对分权与竞争逻辑的理解,引导地方政府形成有利于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性竞争,从而避免过度着眼于短期经济发展速度的非理性竞争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5): 416 - 424.
- [2] Musgrave R. A.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 [M]. New York: Mc Graw - Hill, 1959.
- [3] 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 [4] Oates W. 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93(2): 237 - 243.
- [5] Brennan G., Buchanan J. 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Fiscal Constitu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6] Tresch R. W. Public Finance: A Normative Theory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7] Qian Y., Weingast B.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Market - 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996(1): 149 - 185.
- [8] Zhuravskaya E. v.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Fiscal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3): 68 - 97.
- [9] 张璟, 沈坤荣.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3): 56 - 62.
- [10] 刘卓珺, 于长革. 中国财政分权演进轨迹及其创新路径 [J]. 改革, 2010(6): 31 - 37.
- [11] 余世勇, 朱咸永.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增长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9(7): 40 - 51.
- [12] 官永彬.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30 - 38.
- [13] 陈超. 国税地税合并的制度逻辑及其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影响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8): 111 - 117.
- [14] 杨晓妹, 刘文龙, 林凯琳. 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对规范地方政府税收行为的逻辑解析及延伸思考 [J]. 税务研究, 2019(5): 92 - 96.

- [15] Hayek F.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4): 519 – 530.
- [16] 张军, 高远, 傅勇, 张弘.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J]. 经济研究, 2007(3): 4 – 19.
- [17] Bucovetsky S. Public input competi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9): 1763 – 1787.
- [18] 朱雅玲. 晋升锦标赛下地方政府竞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公共品供给竞争视角 [J]. 中国经济问题, 2019(5): 76 – 93.
- [19] Wilson J. D. A Theory of Interregional Tax Competitio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6(3): 296 – 315.
- [20] Bucovetsky S., Wilson J. D. Tax Competition with Two Tax Instrument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1(3): 330 – 350.
- [21] 储德银, 费昌盛, 黄暄. 地方政府竞争、税收努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J]. 财政研究, 2020(8): 55 – 69.
- [22] 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23] 杨瑞龙. 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J]. 经济研究, 1998(1): 3 – 10.
- [24] 冯兴元, 刘会荪. 论我国地方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2(4): 26 – 32.
- [25] 郭栋, 胡业飞. 地方政府竞争: 一个文献综述 [J]. 公共行政评论, 2019(3): 156 – 173.
- [26] 吴旬. 土地价格、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失灵 [J]. 中国土地科学, 2004(2): 10 – 14.
- [27] 李军杰, 周卫峰. 基于政府间竞争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以铁本事件为例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1): 49 – 54.
- [28] 王华春, 平易, 崔伟.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竞争的空间效应研究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9(4): 49 – 59.
- [29] Breton A. Competitive Governments: 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0] 樊纲, 张曙光.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31] Qian Y.,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5): 1143 – 1162.
- [32] 刘汉屏, 刘锡田. 地方政府竞争: 分权、公共物品与制度创新 [J]. 改革, 2003(6): 3 – 28.
- [33] 王文剑, 仇建涛, 覃成林.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 FDI 的增长效应 [J]. 管理世界, 2007(3): 13 – 23.
- [34]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的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J]. 经济研究, 2004(6): 33 – 40.
- [35] 张军. 中国经济发展: 为增长而竞争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5(4): 101 – 105.
- [36] Tsui K. Local Tax System,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1): 173 – 196.
- [37] 邓晓兰, 刘若鸿, 高远. 经济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J]. 财政研究, 2019(4): 23 – 41.
- [38] Edmiston K. D., Turnbull G. K.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B/OL]. http://frp.aysps.gsu.edu/frp/frpreports/Report_83/Rpt83text.pdf. 2003.
- [39] 张维迎, 栗树和. 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 [J]. 经济研究, 1998(12): 10 – 17.
- [40] 辛冲冲, 陈志勇.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再检验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6): 1 – 14.
- [41] 崔志坤, 李菁菁.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产业结构升级 [J]. 财政研究, 2015(12): 37 – 43.
- [42] 李扬.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竞争力 [J]. 财贸经济, 2001(12): 17.
- [43] 刘晓明, 谭建立, 刘小勇. 转移支付、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经济问题, 2020(9): 36 – 45.
- [44] Keen M., Marchand M.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7(1): 33 – 53.

- [45] Young A.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4): 1091 – 1135.
- [46] Jayet H. , Paty S. Capital Indivisibility and Tax Competition: Are There too Many Business Are – as When Some of Them are Empty?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6(3): 399 – 417.
- [47] 张旭昆 , 李晓红.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发行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9): 62 – 70.
- [48] 银温泉 , 才婉如. 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 [J]. 经济研究 2001(6): 3 – 12.
- [49] 张恒龙 , 陈宪. 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6(6): 57 – 64.
- [50] 傅勇 , 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J]. 管理世界 2007(3): 23 – 35.
- [51] 郭文伟 , 周媛. 地方政府竞争、土地财政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国 276 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J]. 财经论丛 2020(10): 22 – 32.
- [52] 陈抗 , Hillman A. L. , 顾清扬. 财政集权化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J]. 经济学季刊 2002(1): 111 – 130.
- [53] 罗小娟 , 张新芝 , 赵波.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价——基于江西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金融教育研究 2018(1): 59 – 65.
- [54] 周业安. 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1): 97 – 103.
- [55] 靳涛. 资本倚重、投资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再思索 [J]. 统计研究 2005(9): 37 – 41.
- [56] 秦琳贵 , 沈体雁.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 [J]. 经济经纬 2020(5): 1 – 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WANG Jun^a , JIANG Nannan^b

(a. Foreign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b.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Guiyang , Guizhou 550002 , China)

Abstract: Economics believes that social resources are scarce relative to demand. The fact of scarce resources makes economic participants compete for limited resources. Competition exists not only in the market , but also between governments. To study government competition , we must analyze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o create incentives for competition. From the reason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 Chinese sty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form , the mechanis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ffecting government competition , and the economic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timulating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Incentive

(责任编辑: 黎 芳)